

从传统走向开放的贵族

——试论托尔斯泰的晚期风格

王贺白

(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台湾 333)

提 要：当今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文化霸权，普罗阶级仍难望其项背。写作托尔斯泰的晚期风格，即是尝试透过这位从传统走向开放的贵族，汲取其批判布尔乔亚文明之声。托尔斯泰的晚期作品与言行，让我们了解到，以社会整体福祉为职责义务的开放贵族，依旧有其积极的存在意义。世界观转变前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仍挽回不了传统贵族的困境。经过忏悔后的托尔斯泰具体而微地实践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少年》中的开放贵族期许。因此，从文学艺术到政论批评的重心转换，是托尔斯泰一生的自然蜕变。对于“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托尔斯泰以挑战自己的贵族出身作为响应。其后期趋向道德宗教的“不以暴力抵抗恶人”信念让他相信，俄罗斯摆脱东方民族屈从命运后，不是走向西方民族代议的覆辙，而是不顺从政府，以及自食其力地返回农耕生活。而托尔斯泰最后的离家出走，不仅是与世难谐下的继续前行，同时也是传统贵族迈向开放贵族的复活的史诗象征。

关键词：晚期风格；与世难谐；义务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1 开放贵族的当代意义

1927年班雅明(W. Benjamin)游历莫斯科后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说明当时俄国的文化落后状态，造成当时新政权面临严酷考验。班雅明在笔记中写道：“俄国普罗阶级在革命成功后的状况是多么不同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状况。当时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化斗争，那时教育早就被第三等级思想所渗透，思想争夺战先于政治变迁。然而今天俄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文盲成千上万，普遍教育的基础还有待建设，而这正是当前俄国最重要的全国性任务。”(1978: 118)

卢卡奇(G. Lukacs)在1938年的《问题在现实主义》中，感同身受班雅明同样的困境，引述了格·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以下的一次晚会谈话：

“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文学的手段，为本阶级的事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是什么东西使得骑士阶级的残余贻笑天下？是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堂·吉珂德》。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贵族统治的斗争中，《堂·吉珂德》曾是资产阶级手中最强大的武器。革命的普罗阶级起码需要一个小小的塞万提斯(笑声)，一个能够给予它同样一种武器的塞万提斯(笑声，掌声)”(1980: 28)。

遗憾的是，七十多年过去了，属于对抗资产阶级的《堂·吉珂德》仍旧尚未出现。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霸权可能仍正处于极盛期，正如同封建社会也曾经历数千

年才瓦解。如今，在普罗大众对布尔乔亚仍旧处于文化劣势时，来自传统贵族的批判资产阶级之声依旧强而有力，值得借鉴。托尔斯泰（Leo Tolstoy）创作的晚期风格，主要来自这样的问题意识。文章尝试说明：经历精神危机之后，托尔斯泰落实“开放贵族”的想法，具体实践并终其一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F. Dostoevsky）¹1875年写作《少年》第一部结束后，完成一篇没有发表的《前言稿》，抒发他内心不为人知的“地下室悲剧”，并称自己是“第一个写出了代表俄国大多数人的真实的人”。他认为，像托尔斯泰等众多作家所描绘的人物，是特殊而非普遍的多数人，仅是表达“浅薄自爱的诗意”。而在接下来的《少年》第二部中，透过书中的没落贵族为尔西洛夫，传达出对传统贵族的开放解释。

为尔西洛夫认为，公爵封号的实质是崇高的荣誉与义务。俄罗斯贵族的未来，在于过去的“敞开”传统，而现在更是要彻底的时候。“每一个人只要在荣誉、科学和勇敢方面建立任何功勋，他就有权进入上层人物的行列。”如此，这个阶层就可成为“优秀人物”的集合体。这样，封闭的特权阶层得以转化为开放的革新团体，这个阶层才能继续保存下来。²

而几乎与《少年》同一时间，托尔斯泰正在写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没有出路，列文陷入危机。《少年》最后，作者甚至间接指涉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历史小说而非文学，并暗指孤僻忧郁的列文“是个退场人物”。而有趣味的是，托尔斯泰完成《安娜·卡列尼娜》并经历危机与“忏悔”之后，其接下来的作为几乎可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放贵族”思想的具体实践。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世，托尔斯泰悲痛不已，第二年他参加了莫斯科民情调查。在完成《忏悔录》的同时，他思考着“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可以说，托尔斯泰在创作《战争与和平》与呈现贵族社会画轴的《安娜·卡列尼娜》后，过去“浅薄自爱”的托尔斯泰，确实力行那开放贵族的实践。此一开放贵族论点，在只重“权利”忽视“义务”的今天，更显珍贵。特别是有鉴于班雅明与卢卡奇的觉察，在普罗阶级文化尚未建立自信之际，那来自传统贵族，而且是“开放”的优秀人物的自我期许，是抗衡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宝贵之声。

本文章节，首先描述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之前的创作历程，特别是《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前者是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入侵，后者则是英国工业革命后，俄罗斯贵族社会强烈感受资本主义威胁的真实写照，而两者所显现的，都是细微情节联系着整体的史诗风格³。《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累积的颠覆能量已是传统贵族所能承载的极限。《安娜·卡列尼娜》尾声的列文，生命已经岌岌可危。《忏悔录》正式揭开托尔斯泰晚期风格的序幕，《艺术论》与《复活》是后来开展的一体两面，晚年托尔斯泰的写作，“艺术与否”已非其所虑。正如1908年俄罗斯批评家柯罗连柯（V. Korolenko）所说的：“思想家托尔斯泰同艺术家托尔斯泰完全是浑然一体的；……思想家托尔斯泰完全是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产物”。（柯罗连柯 1983：508）

情境使然的最终离家，“细微”的象征行动，再次“史诗式”地联系着他整体一生的作为。托尔斯泰的晚期风格是：以有限生命，指向无限的“继续前行”（walk on）。从而，托尔斯泰向我们证明，传统走向开放的贵族在当代仍有其未完成的积极意义。

2 托尔斯泰的晚期风格讨论

评论家巴赫金（M. Bakhtin）1930年为《列夫·托尔斯泰文学作品全集》第十一卷所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戏剧作品〉序言》中提及，在经历了所谓“托尔斯泰危机”之后，在涉及1860年代所有迫切问题时，这位忏悔贵族“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毁坏宗法制家庭和宗法制关系的画面”。

巴赫金也提及，托尔斯泰在宗教世界观上有着两个选择：一是接近卡尔文新教，珍惜世间才华、崇尚有效劳动与企盼美好生活事业兴旺；另一则是东方佛教的云游四海，反对一切财富与任何入世有为。巴赫金认为，托尔斯泰最后三个剧本是专写“出走主题”。显然后一条路主导他的晚年生活。托尔斯泰最后，果真成为一个云游四方的东方苦行僧，踟蹰在俄罗斯的大道上。（1998（3）：1—11）

2.1 阿多诺（T. Adorno）的贝多芬（L. Beethoven）笔记

1898年，托尔斯泰在其《艺术论》中，否定艺术创作的独立价值，直指贝多芬的晚期作品，称其不知所云，他还特别点名其第二十八号钢琴奏鸣曲“是假的”。而有意味的是，贝多芬晚期作品的风格，正是从其1816年创作那首被托尔斯泰视为“假”的，第二十八号钢琴奏鸣曲开始的，而这正是阿多诺有关“贝多芬晚期风格”讨论的滥觞。

事实上，托尔斯泰对贝多芬晚期音乐的“不知所云”批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身为可能是最后一位“忏悔贵族”的托尔斯泰，确实是无法明了“第一个资产阶级艺术家”贝多芬的晚期风格。

贝多芬晚期作品的独特风格，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诠释，直至1934年阿多诺尝试论述“贝多芬的晚期风格”。阿多诺称那是“主体性石化”，那休止、突兀与停顿，也就是主体冲决而去的当下，作品感觉被遗弃在后，犹如碎瓦纷飞。

阿多诺认为贝多芬作品的晚期风格，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最早完成与“率先抗议”，那是“异化”也是“疏离”。这些寓言般的作品，如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第九号交响曲、庄严弥撒曲、最后六首弦乐四重奏与十七首钢琴小品等，构成近代文化史的一个事件。这位对音乐掌握得炉火纯青的贝多芬，竟选择放弃与他所属的社会秩序的沟通，而与那套社会秩序形成矛盾、疏离的关系。这是贝多芬对他所处社会的自我放逐。显现在音乐元素上，则是“和声的枯萎”。因为对和声缺乏信念，所以尽可能规避和声，呈现出“异化世界的全体性”，像一个人在那比手画脚，喃喃自语。阿多诺对此评论道：和声在晚期贝多芬作品里的命运，犹如宗教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命运：它继续存在，但被遗忘（T. Adorno 2007：277）。

贝多芬被阿多诺认为是西方古典音乐的主体确立者，音乐不再从属来世彼岸的宗教，或是作为王公贵族的门面装饰。而这是封建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然而，这位音乐家最后约十年的晚年岁月中，却与周围欢迎他的世界拉开距离，石化与暴躁的音乐语言，让同时代人摸不着头绪。在晚期作品里，主体性的力量就是它离开作品时，所用的“暴躁手势”。分裂取代和谐，并藉此无视时间，但求存诸永恒……。阿多诺为此说：“在艺术史上，晚期作品是灾难。”（T. Adorno 2007：229）

在《现代音乐哲学》中，阿多诺进一步认为，第二维也纳学派的荀白克（A. Schoenberg）无调性音乐才是真正贝多芬晚期风格作品的真正承继者，那是不可协调性、否定性以及“无法流动”（immobilities）。阿多诺指出，说贝多芬可以理解，而荀白克则否，实属欺人之谈。接着他认为：广大听众与新音乐隔绝、避而远之，殊不知，让他们无所适从的“不和谐”，其最深刻的源流，正是来自这些听众的真实处境（T. Adorno 2007：6）。

2.2 萨依德（E. Said）的进一步说明

巴勒斯坦裔的萨依德，在晚年的一次访问里，说他是“最后的犹太知识分子”，是“阿多诺的唯一真正追随者”。而后，在萨依德身后整理结集的《论晚期风格——与世难谐的音乐与文学》一书，其“晚期风格”论述直接承袭自阿多诺。书中的《时序性与晚期》中的一段话，是从其“个人理由”讨论晚期风格：“我是一个世俗程度很深的人，多年来一直透过三大问题层次研究这个自我塑造的过程，这人类三大问题是一切文化和传统所共有的……”萨依德指的三大问题是：开始、延续与晚期（E. Said 2006：4—8）。

“开始”的概念，是出生和起源，而放在历史的脉络看，则是许多事物的启动。萨依德1975年写作的《开始：意图与方法》即是讨论此一主题，他援引维科（G. Vico）的《新科学》书中的重要观念，世俗的“开始”（Beginnings），而且还是复数的“开始”，对比宗教的单一“源起”（origin）。而“延续”即是从出生到青春、生育与成熟：是“化身的辩证”也可称“生命的逻辑”。在这延续的过程中，大多数人皆会希望凡事“各有其时”（timeliness）。

而“晚期”则是，一个人健康变坏，开始意识到生命终点，就在可见的未来，正如贝克特（S. Beckett）所言：“死亡随时都在看着我们”（Death has not required us to keep a day free）。而萨依德对“晚期风格”的明确定义则是：伟大的艺术家在其人生接近尾声之际，其想法或作品，如何呈现为，一种新的特征或作风。

萨依德首先提及的，是一般人熟悉的“超凡宁静”（unearthly serenity）。人的智能与年纪俱增，其作品反映出一种特殊的成熟，达到“毕生艺术努力的冠冕”，如林布兰特（H. Rembrandt）、马蒂斯（H. Matisse）与巴哈（J. S. Bach）等人。然而，正如阿多诺所注意到的贝多芬晚期风格，萨依德继续说：“如果晚期艺术并非表现为和谐与解决，而是冥顽不化、难解，还有未解决的矛盾，又该怎么说呢？”他首先想到的是易卜生（H. Ibsen），然后也包括书中提到的理查德·史特劳斯（R. Strauss）、莫扎特（W. A. Mozart）、惹内（J. Genet）与顾尔德（G. Gould）等人。萨依德称这第二种晚期风格为“与世难谐”（against the grain），是一种悲憾人格的自我放逐，与其所处的世界格格不入。

托尔斯泰的晚期作品及其最后客死驿站，正是以上第二种晚期风格“与世难谐”在文学上的另一个例子。有意味的是，托尔斯泰可能不知，当他自己进入晚期风格，其直接点名贝多芬第二十八号钢琴奏鸣曲“是假的”时，这作品正好是阿多诺隔了近四十年后讨论贝多芬音乐“晚期风格”的开始。

2.3 晚期的托尔斯泰风格

前面曾提及，托尔斯泰的晚期风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放贵族”的具体实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中，除了第二部为尔西洛夫关于“开放贵族”陈述外，在第三部中，更是完整地阐述了俄罗斯贵族的独特与苦闷，甚至是尝试对各种思想的全面调和。没落贵族为尔西洛夫对着他的私生子阿尔卡季（少年）谈到，有关1871年巴黎公社事件：

唯独我，处在所有的纵火者中间，能够当面对他们说，他们焚毁杜伊勒里宫是个错误；唯独我，处在保守党复仇者中间，能够对复仇者说，焚毁杜伊勒里宫虽说是犯罪，但毕竟合乎逻辑。这是因为，我的孩子，当时在欧洲只有我这样的俄国人，才是唯一的欧洲人。我指的不是我个人——我是指整个俄国思想（2010（14）：625）。

为尔西洛夫接着说，可那时全世界又有谁能理解这样的思想呢，所以我孤独地漂泊，这是俄罗斯的忧郁，也是俄罗斯贵族的苦闷。

这个“苦闷”在于，当法国人、德国人与英国人等，都仅仅只为自己国家效劳，俄罗斯人却奇特地想着，未来的欧洲人应当如何。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彼此的冲突，让德国人还过分地只是德国人、法国人还过分地只是法国人时，双方其实还未演完自己的角色。而这样的彼此破坏，令俄罗斯贵族心疼。为尔西洛夫认为自己也是这约一千人的独特俄罗斯贵族，他非常尊重自己的贵族身分，“我国经历了许多世纪，才造就了一批高级的文化人，这些人任何地方都没见过，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这类人心怀天下，关怀所有的人。”

然而对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中列文的批评，称他独行其是，并热烈赞同当时俄罗斯到塞尔维亚对土耳其进行战争。我们发觉，“心怀天下、关怀所有人”的反而正是反对这场俄罗斯对土耳其战争的列文，是托尔斯泰在小说中的第一人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里的关于“开放贵族”讨论，与其1877年《作家日记》中对列文的批

评是前后矛盾的。

托尔斯泰的晚期风格⁴，正是跨出自己的贵族身分，真正体现心怀天下关怀所有人的“托尔斯泰主义”：道德的自我完善、非暴力与博爱。这不仅显现在，透过列文的陈述，即使对不同宗教、文化语言的土耳其，也不应兴起战争。甚至后来，托尔斯泰也希望沙皇政府与革命派相互和解。1908年，虽然仍不同意革命者的暴力手段，但眼见政府对革命者的残酷迫害，托尔斯泰发表《我不能沉默》，同时对自己的“安宁”无法忍受，希望能从中解脱。

1882年，托尔斯泰与一位朋友的书信中提及这一段面对困难努力探索的“内心告白”，今天看来，依旧动人：

看看我从前的生活和我现在的生活，你就会明白，我是竭力想实行它们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尽全力试着实行它，在我每一次失败的时候，我不只是忏悔，还祈求帮助，使我能实现它，我很乐意遇到和倾听任何像我一样探索这条道路的人。（莫德（Aylmer Maude）1984：592）

屠格涅夫（I. S. Turgenev）在1883年写给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封信中，虽然，发自真诚地希望他回到从前的艺术创作，“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但从中我们也得知，托尔斯泰的“探索道路”是不为屠格涅夫所理解的。

著名的托尔斯泰传记作家，英国人莫德曾经写下如此描述托尔斯泰内心挣扎的语言：“那些因为托尔斯泰从事宗教问题、道德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表示惋惜的人，正表明了他们自己的局限性。甚至他的小说的大部分价值，也正是得力于他对真理与博爱的渴求，这种渴求是他从幼年到老年的特点，只有那些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所吸引的人，才能真正地欣赏《战争与和平》。”（1984：605）

3 世界观转变前的传统贵族

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之为“双元革命”，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 Hobsbawm）在其著作《革命的年代》中提出的西方世界迅速变革的著名论述（1996：4）。

大航海时代最后推演出的双元革命让这原本数千年传统世界变了样，我们把它称为“现代化”，传统无可避免地必须走向现代。俄罗斯社会从彼得大帝以来的欧化改革可以说是第一个非西欧传统社会非常有意识地正面应对这现代化变迁。事实上，法国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是在普罗大众的支持下进行大革命，推翻封建贵族的寡头统治。然而革命后，资产阶级随即抛弃过去的普罗大众盟友，与传统贵族合作。拿破仑（Napoleon）正是此一情境下的人物，两个阶级混血的“贵族资产阶级”维护者。

经历1825年“十二月党人”事件之后的俄罗斯，更是此一西欧历史变迁的翻版。贵族更加势弱，逐渐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翻了好几翻”的暴发户。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在他的创作初期，一方面描写贵族经历，恨铁不成钢；另一方面痛斥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胡作非为。不过，面对他比喻的这片“泥泞”的俄罗斯，他选择的是沿着这片泥泞温和地“绕弯走”，而非激烈的“向上爬”。

3.1 从《童年》到《哥萨克》

从1852年的《童年》到1862年的《哥萨克》，托尔斯泰已经跃居俄罗斯文坛的重要成员。这段期间的创作题材，主要是以其亲身经历的贵族生活与高加索从军为题材。这是托尔斯泰创作历程的“开始”阶段。

《童年》、《少年》与《青年》被称为托尔斯泰的“成长三部曲”；而之后的《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年），则是根据他大学中辍，1847年19岁回到家乡，希望实现农业改革的真

实经历，是三部曲的续篇。《童年》的时空只有两天（一天在庄园、一天在莫斯科），以主角希望过自觉生活开始，但却以失去童心结束；《少年》描述少年在童年之后逐渐腐化，然后在青年时期之前的改善；《青年》则是写对美、幸福与美德的向往，但最后的第四十五章标题却是“我失败了”，即是指大学考试失败了。《一个地主的早晨》就是这样一位学业失败的青年（随时携带着卢梭（J. J. Rousseau）的《忏悔录》与《爱弥儿》），第一次回乡一展抱负的亲身经历。这位年轻地主怀抱着善良的心，像进行慈善事业般，尝试改善农村生活也不可。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以至接下来生活荒唐。

托尔斯泰耽溺恶习几年，终于在其大哥引导下，同赴高加索，感受大自然之美与朴实生活。并且后来实际参与对车臣山民的袭击与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特别是黑海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袭击》的前面，即引述柏拉图（Plato）对勇敢的定义，“该怕的怕，不该怕的不怕，这就是勇敢”。而这“勇敢”定义，即是从军的托尔斯泰评定人物的最重要标准。在众多短篇战争小说中，作家歌颂朴实平凡的士兵与普通军官；而对那些外表威武、内心胆小、漠视士兵伤亡的贵族军官充满鄙夷。小说一反过去战争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在描绘战士英勇的同时，也不隐讳他们的害怕以及战争的残酷。小说中，不仅表达了对车臣山民的同情，同时也对战争的意义表示怀疑。

不管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故事，还是《弹子房计分员笔记》与《高加索回忆片段：一个贬谪的军官》，都反映了贵族军官生活的空虚与堕落。托尔斯泰原本希望战争可以使统治阶级得到道德上的复兴，并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但这样幻想也落空了。在《两个骠骑兵》（原名为《父与子》）里，老土尔宾仍旧有着正面的封建骑士精神，而小土尔宾则是染上工于算计的资产阶级习气，在这意在言外的人物描述中，新的资产阶级文明要负最大责任（在稍后的《卢塞恩》与《波利库什卡》中，表达的更直接）。

如果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代表着托尔斯泰的第一次回农村改革，那么《哥萨克》就是其第一次“出走”，描写他1852年前往高加索从军的真实经历。奥列宁摆脱了莫斯科的虚伪生活，迷醉于高加索自然美景与生息于此的哥萨克人。其中耶罗施卡与玛丽雅娜更是大自然熏陶之下的人物，与文明社会截然对立。作品里呈现着卢梭思想和对上流社会的批判，有着平民化的意愿，以及为他人活着才是幸福的想法。托尔斯泰想从半开化的哥萨克中找寻俄罗斯的未来。主角奥列宁希望改变自己，融入这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就是使自己适应外界而不是去触动外界，这是他创作初期选择“绕着弯”路走的路径。

3.2 从《战争与和平》到《安娜·卡列尼娜》

在创作初期，托尔斯泰现实中的所有愿望都未得到正面响应，代表这阶段尾声的《哥萨克》，几乎等同思想上的“出走”。而总括地说，由于自己的贵族出身，所以他把这新时代的诸多弊端，更多地指向，是新兴资本主义文明造成，对于过去的封建体制，则是尽可能轻轻带过（《阿尔培特》突出强调艺术家的心理与《三死》指向大自然，并非偶然）。

1862年，与托尔斯泰同年出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N. G. Chernyshevsky）被捕，而托尔斯泰家则被搜查（调查其是否与流亡海外的赫尔岑（A. I. Herzen）有联系），象征着这两人未来不同的走向与主张。狱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下《怎么办？》，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新人”的伦理观是合理利己主义，同时也在高压迫害下，主张非常手段的暴力革命，揭开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新方向。而托尔斯泰除了继续完成《哥萨克》外，也有讽刺“新人”的剧作《一个被传染的家庭》问世；另一方面他也搁下已写作数章的《十二月党人》，因为他不能认同十二月党人疏离人民，而又主张革命手段。

托尔斯泰把目光转向过去历史，间接表达对当代贵族阶级的不满；但他又无法认同革命民主主义的激烈主张，于是转向最广义的“人民思想”（其“人民”几乎等同于“民族”）。1863年，托尔斯泰着手《战争与和平》，他藉古托今，希望能有像“我们的公爵”安德烈、

“我们的老爷”皮埃尔等优秀贵族领导俄罗斯的未来。这是托尔斯泰创作历程的“延续”阶段。

3.2.1 《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问世，几乎使当时深受西欧文学影响的俄罗斯文学界不知所措，甚至按原本西欧文学的框架也无法归类。在一开始出单行本时，托尔斯泰接受了评论家的意见，删去关于历史哲学议论的部分；但十多年后，他又全部补齐。补齐的部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后来为何会放弃文学而转向道德宗教⁵。当俄罗斯面临拿破仑此一“贵族资产阶级”的威胁时，有像脱离人民的华西里首都贵族的虚假做作，但也有像与人民融为一体的，如罗斯托夫乡间贵族的质朴善良。当拿破仑占领莫斯科失败后，罔顾自己的士兵受冻，以最快的速度逃回法兰西；对比之下，面对几十万的法军撤退，库图佐夫（M. I. Kutuzov）却一直不愿下追击命令，希望他们赶快沿着原路离开俄罗斯。

而“我们的老爷”皮埃尔，第一次参加社交晚会时，也是为拿破仑辩护。“拿破仑伟大，因为他站得比革命高，他制止了革命中的过火行为，保持了一切好的东西，像民权平等啦，言论出版自由啦，因此他获得了权力。”然而当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却冲击着皮埃尔，且“认为这灾难是拿破仑一人造成的”。后来皮埃尔向娜塔莎说，他就是从普拉东那里，“才获得精神的宁静与内心的和谐”。在书中，托尔斯泰有意将这位“善良的圆圆的俄罗斯人典型”描述为“我们的老爷走向我们的民众”。当拿破仑“一马当先”逃回法兰西时，交换的画面是身患热病的普拉东再也走不动。他同其他掉队的俄军俘虏一样，靠在一棵桦树下，无怨无悔地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到来尽头。而当皮埃尔确知普拉东被枪决，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乐天的生命在残酷的历史面前，竟还是必须为这样的命运继续“乐天”。

另外，罗斯托夫伯爵家的尼古拉，原本满怀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Tsar）效忠之情，但却在1809年看到其与拿破仑在涅曼河会面。尼古拉怒气冲冲地说：一个合法的皇帝不可以跟罪犯拿破仑讲和。让尼古拉感慨的是：如今拿破仑当上皇帝了，亚历山大皇帝也喜欢他，尊敬他。那么，那些丢胳膊缺腿的人和牺牲的人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自己的疑惑，很快地就自我回答，然后在同胞间，愈说愈大声：

我们又不是外交官，我们只不过是士兵，要是命令我们去死，我们就去死。要是我们受惩罚，那就是说罪有应得，我们可无权批评皇上。皇上承认拿破仑是皇帝，跟他订立同盟，就是说应该如此。要是我们对什么事都说三道四，那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了。这样我们就会说，上帝不存在，什么也不存在了……。（2004（7）：567）

之后，尼古拉不断喝酒，间接地表达了他内心的困惑与无奈。战争结束后，尼古拉认真经营起农业。不过，尼古拉不喜欢当时流行的那套英国办法，嘲笑经济理论，不喜欢办工厂与单一农业生产。玛丽亚公爵小姐惊讶于自己丈夫对农业的热爱。特别是尼古拉认为农民不应是手段，而是目的和法官。从《一个地主的早晨》的聂赫留朵夫到《战争与和平》的尼古拉，然后联系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这是传统宗法观点的完成。所以，后来列宁（V. I. Lenin）会一边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边对高尔基（M. Gorky）说：“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在这位伯爵出现之前，我们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欧洲有谁能同他并肩媲美呢？……没有！”（卢卡奇 1950：127）

3.2.2 《安娜·卡列尼娜》

俄罗斯击退入侵者拿破仑，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既然有西方民族的东征，自然也就有东方民族的西征”。亚历山大一世亲率俄军，一路追至巴黎，俄普奥联军终击溃法军，占领巴黎，俄国势力深入中欧。一方面，由于俄国军官亲征西欧与驻军巴黎年余，亲身体会西欧较为自由的思想。他们返国后，深感俄国落后，对沙皇制度渐表不满。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逝世，爆发了要求改革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而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也让俄罗斯“翻

了一番”。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过程中，经济大变动已然成形。1870年代初期，托尔斯泰离群索居于农村，刻意避免政治旋风“将他刮走，使他迷路”，甚至在他世界观产生质变危机之际，还购置庞大田产。

对于旧秩序分崩离析，托尔斯泰原本想写有关彼得大帝，企图再次从过去历史探究其原因。但这个《彼得大帝》的写作计划最终作罢，则是因为托尔斯泰无法认同彼得大帝的改革，并认为这是让俄罗斯如今深陷西欧资本主义的最早起源。由于现实变化已历历在前，《战争与和平》寓意其中的优秀贵族领导业已破灭，于是响应眼前现实，已是无法回避。

《安娜·卡列尼娜》是写家庭悲剧的小说，却也是史诗，从家庭的混乱延伸至整个社会。透过舞会、赛马、割草，以至最后俄、土战争讨论，“整体性”史诗风格依然寓意在众多细节中。如：安娜在与伏伦斯基舞会后，注意到卡列宁的大耳朵；对比后来，安娜从伏伦斯基的面部表情，看出他对她的厌恶。

《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奥勃朗斯基、卡列宁，包括列文与吉娣，都有独白“我没有错”。而除了安娜之外，其他人说完“没有错”之后，都没有进一步探问：“那，到底是谁的错？”⁶对照之下，安娜在对着陶丽说了“可是我没有错”后，却紧接着询问：“那么是谁的错呢？错在那里呢？难道有别的办法吗？”或许这正是托尔斯泰将书名定为《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原因。

在新时代要求更多劳力加入劳动市场，这是农奴、黑奴获得解放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相较封建社会有效率的地方。那原本代代相传的职业宗法，被相对自由的市场法则取代。然过去的奴隶都获自由了，那女性的自由在哪呢？

对安娜最亮丽的描述，是陶丽前去探访她的整个过程。路途中，陶丽回顾自己15年的婚姻生活是如何受罪，然后心中浮现“他们攻击安娜。为了什么？难道我比她好吗？”陶丽心中的答案竟是：“安娜的行动了不起，我说什么也不能责备她。”没多久，出现在陶丽面前的是“戴着一顶高帽露出一绺绺乌黑头发的漂亮脑袋，她那丰满的肩膀，她那穿着黑色骑装的苗条身段，以及端庄优美的骑马姿势，这一切都使陶丽感到惊讶。”当陶丽还在思索女人骑马是轻浮还是优雅时，安娜竟不需他人搀扶跳下马，高兴地迎向陶丽而去。之后在与陶丽闲聊时，充满生之欢愉的安娜，仿佛透露之后急转直下的可能话语：“我不想表白什么，我只要生活；我不想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我有这样的权利，是不是？”

相较安娜的自由追寻，其丈夫卡列宁则总是上对下、自我中心地生活着。从卡列宁与儿子的应对中，我们更能体会安娜八年婚姻的苦闷。“谢辽查觉得，父亲对他说话，总是像对一个凭空想象出来、只有书本里才有的孩子说话……。”甚至在卡列宁“饶恕”安娜的那一段，也是自我中心地，感受这“饶恕的幸福”。卡列宁将自己的名利列为首要，不尊重对方主体，任何活生生的生命，在其掌控下都为之黯淡无光。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时代诞生的机械典型人物。

安娜非常有勇气地，走出“虚伪人生”；但时代的限制，她的“我只要生活”自信，还没有达到完全对自己“主体性”确立；她对伏伦斯基的爱情依赖，使她一步一步走向毁灭。

没有儿子抚养权的希望，加上对伏伦斯基依赖，换来的是与日俱增地遭到嫌恶，安娜终至对整个世界绝望。为何整个婚姻悲剧是由伏伦斯基引起，但到后来，整个社交圈的门仍对伏伦斯基敞开，但却对她完全封闭。安娜的心跳加速，“既然再没有什么可看，既然什么都叫人讨厌，为什么不把蜡烛灭掉呢？”安娜最后以结束自己生命，向整个社会，表达最深沉的抗议。对安娜困境的疑惑，我们应是不会停留在绝望与憎恨之中，反而小说读完，会想起安娜的那一句话：我没有错，那到底是谁的错呢？

3.3 从“多余人”到“退场人物”

“多余人”是受拜伦（G. Byron）思想影响，但在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 Tsar）的专制统治下，俄罗斯贵族无法有所作为的苦闷象征。而其特点是，生活在优裕环境中，受过良好教育，虽有高尚理想，但却远离一般民众；不满现实却无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只能在愤世嫉俗中，浪费一生。这样的“多余人”文学画像有：普希金（A. S. Pushkin）《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奥涅金、莱蒙托夫（M. I. Lermontov）《当代英雄》的毕巧林、赫尔岑《谁之罪？》的别利托夫，还有屠格涅夫《罗亭》的罗亭与冈察洛夫（I. A. Goncharov）《奥勃洛莫夫》的奥勃洛莫夫。

“多余人”既不愿站在政府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融入民众，反对专制和农奴制度。他们心仪西方自由思想，不满俄国现状，但也无力改变。

3.3.1 带有多余人特征的安德烈

《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的出场描述“疲倦呆板的眼神到缓慢均匀的步伐”，几乎是普希金的奥涅金或莱蒙托夫的毕巧林翻版。事实上，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德烈，是俄罗斯“多余人”的新时代“过去想象”。

不过，这位格格不入、对周遭“乏味、厌恶”的最早“多余人”安德烈，仍是有着卫国战争的责任。文学人物的出现顺序，刚好与真实历史相反。是安德烈的卫国战争后，历经十二月党人事件，然后才出现奥涅金、毕巧林等这样的“多余人”。

安德烈这位“我们的公爵”，在《战争与和平》中，主要经历两次战争。第一次是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出发之前，安德烈父亲与他的互动，正是俄罗斯传统宗法世界里，典型的贵族职责典范。出征前，安德烈的父亲告诫他说：“你要是被打死，我老头子会觉得伤心……。但我要是知道你的行为不像尼古拉·保尔康斯基的儿子，我会感到……羞耻。”但在这场他乡异地的战役中，安德烈自始就多所踟蹰，他想着，“说来也怪，为了片刻的荣誉，为了战胜敌人，为了获得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们的爱，我会毫不犹豫地抛下自己的亲人”。

会战受伤后，安德烈仰视天空看着、想着：云朵在无边无际的高空中始终从容不迫地翱翔着。一段时间后，拿破仑从安德烈身旁走过，受伤且虚幻荣誉不再的安德烈，却这么想着：这个曾经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与浮云飘飞的苍穹相较，竟是渺小微不足道。从此，安德烈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

伤愈回到家乡，安德烈竟接着面对妻子难产而死，这使他消极，感到生活了无生趣。然巧遇娜塔莎的灿烂笑声与老栎树的披满绿叶重生，让安德烈重燃生命活力。

然当1812年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消息传到彼得堡后，再次决定了安德烈的命运。这次战争再也不是之前的“请客吃饭”，而是生死存亡的保家卫国。拿破仑毁坏他世居的家园，凌辱斯摩棱斯克，八月在鲍罗金诺这里，终于要会战了。会战前夕，我们看到安德烈的言语，已经没有先前的浪漫与犹豫。之前负伤的“天空之诗”，此时成了安德烈生命的不祥预兆。安德烈几乎是以诀别的语气告诉皮埃尔：真正决定明天战役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胜利从来不靠阵地，不靠武器，甚至不靠人数，尤其不靠阵地，而是靠感情，靠我心里的感情，靠每个士兵心里的感情。“法国人毁了我的家，现在又要来摧毁莫斯科，他们一直在侮辱我”。

会战时，安德烈身在最前线，一颗榴弹落在安德烈两步之遥，他就是不愿卧倒，当他跟副官回应卧倒是“可耻”之际，并说着“我不能死，我不想死，我爱生活，我爱这草、这土地、这空气……”，这正是贵族荣誉攸关的关键时刻。

身负重伤昏迷一段时间后，安德烈向医生要求一本《福音书》，放在他身子底下，他生命尽头的幸福是与《福音书》联系在一起。（之后，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写作《安娜·卡列尼

娜》的列文与《复活》的聂赫留朵夫，其生命观改变后，也都依靠着《福音书》。)安德烈透过《福音书》，理解了爱与宽容，正如娜塔莎所说，“他身上起了变化”。在安德烈生命结束之际，娜塔莎与他妹妹玛丽雅公爵小姐，除了悲伤哭泣外，她们也都“因为面对这简单而庄严的死的奥秘，内心充满了虔敬的感情”。

3.3.2 是否该退场的列文

《安娜·卡列尼娜》是两条线平行，除了安娜，还有列文。如果说，安娜是消极地应对“谁之过”，那么列文就像托尔斯泰自己，直接面对新时代的变迁。安娜的逝去象征一位身陷时代巨变的自觉女性，无法主动改变命运的悲剧；而紧接的列文危机，则是一位旧时代贵族面对“一切坚固东西都烟消云散”之际刻骨铭心的经历。

列文自始至终都与农业、农民及其劳动联系着。他喜好乡村厌恶都市，“乡村好就好在它劳动的场所，而劳动又是绝对有益的。”在与其哥哥柯兹尼雪夫争执，特别是列文对现代医疗与学校嗤之以鼻后，他与农民共同进行了一段有益身心的割草劳动。他自己戏谑地用德语说这是“劳动疗法”，陶醉在这样的运动中，“这实在是最幸福的时刻呀。”不过，列文认同许多地主的看法，解放农奴把俄国给毁了，他与他土地上的耕种农民，一直有着紧张的“残酷而顽强的斗争”。由于俄国整体农民的水平比欧洲低，列文一直在思考着经营农业的新计划，包括缩小经营规模等。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彼此不信任也是巨大阻力，因为农民不相信，地主除了掠夺外，还会有其它好的目的，甚至列文也自省到，“劳动者只有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才愿意工作，才肯好好工作”。

而让列文更为苦恼的是，旧的问题都难以收拾了，还必须应对无可抵挡的新的农场经济，也就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问题。小说里，频繁地出现英语，而且到处都是英国货，甚至是模仿英国家庭的生活方式。

与吉娣婚后的列文，对这样的新农业体制，认为是不合理地引进外来文明导致俄国农业衰落。列文反对银行与铁路，认为这些是不劳而获。特别是铁路的修筑，他甚至为文论述，兴建铁路在欧洲无疑是必要，但在俄国却是造成危害、虚假的繁荣，为时过早，就像动物里某种器官早熟，反而妨碍全面发育。比较列文还想与新时代文明抗衡，他太太的姊夫奥勃朗斯基，早就听天由命随波逐流。奥勃朗斯基落魄到，为了希望有个新事业，而在波尔加林诺夫犹太人那枯等两小时，自嘲是“登门求告犹太佬，冷板凳上坐到老！”

书中，安娜与列文这两条并行线，终在奥勃朗斯基的牵引下交会。一幅巨大的女人全身像，吸引了列文的注意。这是安娜的画像，由画家米哈伊洛夫完成。列文正凝视着，这仿佛要从画框里走出来的人。安娜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迎接他，并说着：“我太高兴了”；而列文则是在书房黯淡的光线下，看见了画里的女人。在经历了有关艺术、慈善事业众多主题的谈话后，列文摒除了过去对安娜的成见，认为安娜除了智慧、文雅和美丽外，还有诚实的美德。列文好奇着，这个过去被他谴责的安娜，如今他却以古怪的逻辑替她辩护，为她难过，并且唯恐伏伦斯基不能充分理解她。“冰块融化了”，安娜对列文高兴地如是说。

而在安娜过世后，列文竟也在儿子出生，幸福家庭的外表下，陷入精神危机，小说所陈述的，和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

面对外在世界变动，以及内心世界的痛苦，列文依旧坚持着“善”。这个超越因果奖赏的善，书末提及东正教斯拉夫与伊斯兰教土耳其的塞尔维亚军事行动。托尔斯泰透过列文，一反当时舆论，不以为然这样的军事行动。列文以“我也是人民”表示，再怎么以何之名，要一个俄罗斯人打死一个土耳其人，他是不同意的。要为被压迫的斯拉夫塞尔维亚人作自我牺牲可以，但列文却强调，无论如何都不应杀人。这是善的根本原则。

4 忏悔贵族：发现自己的史诗命运

《安娜·卡列尼娜》写作前后五年，过程痛苦。在那个俄罗斯封建崩解年代，“安娜问题”终成悲剧，结局令人沉思；而潜存其中的“列文问题”⁷，则在书末提升，并成为往后作者的道德与宗教转向。

对照列文的描述，几与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的心灵危机一样。“于是，列文这个身强力壮、家庭生活美满的人，竟几次想到自杀，他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最后列文走出育儿室，凭栏望着天空，“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这种感情却不知不觉痛苦地出现在我身上，并且牢固地扎根在我心里。”

与托尔斯泰有密切往来的英国人莫德，其所撰写的托尔斯泰传记，最早将之分为《前五十年》的第一卷与《以后的年代》第二卷，清楚地标示出：写作《忏悔录》时期的托尔斯泰，正是此一关键分水岭。不过，莫德也提出，这重大转折的“自然蜕变”解释。莫德认为：他以前写的故事和小说，预示了他现在所宣扬的观点；他在雅斯纳雅学校里的的工作，也都趋向这同样方向。在他的生活外表上，没有显出什么突然的改变；后来的是从已经过去了的发展而来的，因此与其说是采取断然的行动，还不如说他逐渐地在爬上一座山岭来得自然。（1984：466）

而这正是托尔斯泰“晚期风格”的开端，从传统贵族走向开放贵族。

4.1 传统贵族的心灵危机

在《忏悔录》之前，托尔斯泰几乎都是以其个人为中心，细心观察人世间的一切，以他独特的艺术观察，将即使是最细微的细节，赋予整体丰富的意含。《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战争与和平》的安德烈、皮埃尔、尼古拉，《哥萨克》的奥列宁或是《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朵夫等，这些小说人物，某种程度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身影。这些小说人物，到列文时，终至迷惘、不知所措。

事实上，早在托尔斯泰 1857 年西欧之行后的《卢塞恩》里，我们就看到，他对原先崇信西欧文明的迷惑。在瑞士的卢塞恩（琉森），托尔斯泰见识到在海外旅游的英国人的言行。英国人在餐桌上表现彬彬有礼、恪遵礼节，但实际上只有一种表情：那就是只满足于自己幸福，对周围与己无涉的东西漠不关心。在这短篇小说中，托尔斯泰特别标注以下事实：对西欧最文明旅游胜地的困惑与抗议。

1857 年 7 月 7 日，在卢塞恩那家头等阔佬下榻的瑞士旅馆门前，一个流浪的讨乞歌手唱歌弹琴达半小时之久。百来个人听他演唱。歌手三次要求施舍。没有一人给他任何东西，有许多人还嘲笑他。

原先，他以为这些国家是俄罗斯必须学习的文明国度，此刻让托尔斯泰为之梦醒。因此，小说的结尾充满着—堆问号：“难道这样的国家是自由的国家吗？”“谁能为我下个定义，什么叫自由，什么叫专制，什么叫文明，什么叫野蛮？”

这样的大诘问，隔了 20 年后，竟转化成对个人存在意义的质疑。在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里，化为以下的一连串问题：“你在萨马拉省将要得到六千亩地，三百匹马，那很好，以后呢？”我傻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考虑。或者当我开始思索怎样教育子女的时候，我会问自己：“目的何在？”或者当我议论别人怎样才能谋得幸福的时候，又突然问自己：“这关我什么事？”或者当我想到我的作品为我赢来荣誉的时候，我又自言自语地说：“好吧，你会比果戈里（N. M. Gogol）、普希金、莎士比亚（Shakespeare）、莫里哀（Moliere）更有名气，世界上没有别的作家能赶上你，那又怎么样？……”我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

如此之危机，使得托尔斯泰做出与列文一模一样的防范，免得不小心结束生命。这之中，他曾消极地羡慕一字不识的农民，好似他们没有这样的苦恼。托尔斯泰这样生活了一两年，

终于出现了转折。那是与那些坦然接受贫病折磨，但仍怀抱信心生活下去的芸芸众生的相处。他说，“我们这一类人，既有钱又有文化的人，我们的生活不但使我厌烦，而且已失去了任何意义。我们的言谈举止以及科学、艺术，在我看来完全是儿戏。我明白，不能从这些地方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认为劳苦民众创造生活的行动，才是唯一真正的事业。于是我明白，这种生活中是真正存在着意义的。我承认这一点。”⁸

托尔斯泰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过着像寄生虫般的生活。脑力活动的极限，使他决定和劳苦大众共同劳动（而这，在列文与农民一起割草时，就已有体会。）过去，靠着仰望天空减低自己的恐惧；而如今，“我已经不往头上看了，因为我整个人越来越觉得，有了牢靠的支柱可以依托了”（2009：84）。

四年后在《伊凡·伊里奇的死》（依据一位图拉法院法官的真实故事改编）可说是《忏悔录》的小说型式创作。“那愈益逼近的可怕又可恨的死，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是假的”；而真心照顾伊凡·伊里奇的农民盖拉西姆则早先就回应他，“我们大家都要死的。我为什么不能侍候您呢？”

伊凡·伊里奇一直过着普通简单的生活，因为生病后，开始自问“是不是我的生活有些什么地方不对？”而当伊凡·伊里奇看着善良的盖拉西姆的脸时，才真正体会到“我这辈子说不定真的过得不对。”他并从他的妻女与医生身上看到了过去自己，“看到了他赖以生活的一切，并且明白这一切都不对，这一切都是掩盖着生死问题的可怕的大骗局”。而在他临死前一小时，由于儿子对他的伤心，而最终领悟一切。可以说，伊凡·伊里奇的彻悟，正是托尔斯泰《忏悔录》后的重生。

4.2 史诗命运：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81 年过世，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来年完成。可能的推论之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世，带给托尔斯泰脱离危机的领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最后，说列文是“退场人物”，而确实在其接下来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人物，都没有了贵族角色，“多余人”正式走入历史。然后托尔斯泰接下来积极走向人民，1882 年实地参与莫斯科的人口调查工作，并多次探访贫民窟。之后完成《关于莫斯科人口调查》和《论人口调查期间的救援工作》，经过补充后，成书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4.2.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提及康德（I. 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因无法证明上帝存在而迷惘；在 1886 年成书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却明白指出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学说不应被忽视。此时托尔斯泰，不仅反驳“谈论道德”是俗气与乏味，甚至说“人类也只在做一件事，即为自己阐明自己赖以生存的道德规律”；“阐明道德规律不但是全人类的主要的事，而且还是唯一的事”。

在莫斯科的都市贫穷调查，让托尔斯泰觉察，都市与农村贫穷的差异。他特别提到：在农村奢侈，对一个有良心的人是寝食难安的；而在都市，大家却可以习以为常。比如，在农村，“当你身边有孩子喝不上牛奶时，而有人却用牛奶洗澡”、“当身边有人居住恶劣、没有木材生火时，而另一些人却在修建陈列室或花园”，都是令人难堪的。而这一切在城市，却被视为“本应如此，文明必不可少的条件”。托尔斯泰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连哭带喊地，对着他一位都市朋友说“不能这样生活，不能这样生活！不能！”

托尔斯泰说，他不是用头脑心灵，而是用整个生命懂得，他过去的贵族奢侈生活就是犯罪。“我不但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还是罪行的直接参与者”。只要有多余的食物，而另一个人完全没有食物，有两件衣服，而别人连一件也没有，“无论世界上一切有学问的人怎样告诉我，这样的事是多么必要，我还是懂得了，这就是犯罪……。”书中，托尔斯泰严词批判，

为这样制度护卫的政治经济学、法学、神学与哲学等。

在这样的“怎么办”的自我追问中，托尔斯泰得出了自我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去做一切我们能做的事”的结论。托尔斯泰质疑慈善活动与许多学科虚假，书中并论述黑格尔“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放任了人们的弱点，四体不勤的“有教养人”的新辩护教义。他自觉可笑地说，竟然经过那么多的探索历程，才达到这“只消开一扇窗”的真理，也就是：体力劳动，去做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书末，他更提及“所有权是万恶的根源”时，认为人一旦将身外之物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时，不只是错误，也将带给自己与他人痛苦。虽然托尔斯泰说，“……因为妻子与儿子永远不可能像我的身体一样服从于我的意志，我的真正的私有物仍然只是我的身体”，而这就像是反面的寓言一样，当往后托尔斯泰准备要抛弃家产时，他的家人，特别是他太太索菲亚（Sophia）无法服从他的意志时，竟是他后半生痛苦的关键所在⁹。

4.2.2 《当代的奴隶制度》

1900年的《当代的奴隶制度》，承自《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但主要的写书缘起，则是他骇然听闻莫斯科至喀山铁路上任职的司秤员所说，那装卸货物的农民，竟然连续劳动36小时。经过他亲自访查，才知这是铁的事实。托尔斯泰透过这篇文章控诉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代的新奴隶制度，比过去的奴隶制更糟糕，“被认为是自由的人们，为了挣得仅够他们糊口的几个钱，不得不去从事这样的劳动。就是在农奴制时代，任何一个最残酷的奴隶主也未必会迫使自己的奴隶这样劳动”。

在进入新世纪之初，托尔斯泰清楚指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荒谬。以资本家与工人的平等竞争为例，就像一个被绑住双手，一个被授与武器，然后两人“都严格遵守同等条件”搏斗一样。托尔斯泰同时也谴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如果让一个师傅一生只做一种物品的百分之一部分”，那是伤害人的宝贵生命，只有自由的劳动分工才符合人性。而农村的劳动则远比都市的工厂劳动较为健康多样，但大结构的经济现实，却使人们一再地从乡村移往城市。托尔斯泰的这些观点，即使经过一百年后，依然是今天血汗工厂的本质论述。

文中也提及美国废奴，何以会有南北差异。托尔斯泰认为，北方人要求消灭旧的奴隶制度，是因为在他们知道已经有了新的奴隶制度，而南方人尚未清楚认识。而只要是违背自己愿望，执行别人的意志，就是奴隶制度。托尔斯泰发现：一种奴役手段，只有当另一种可以替代它时，它才可能被废除。

此外，对于被当时认为进步的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也提出批评。他认为，当劳动分工获得真正合理的改变之后，则物品生产将大为缩小；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却说大家都可享用富裕阶级的东西，这是有着明显的内在矛盾。而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谈社会主义》，再次提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欺骗与迷信。文中除了延续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则会利用政权的力量，对人使用暴力与奴役。

有组织的暴力就是政府，如何消灭使用暴力的国家，每个人应该怎么办？书末，托尔斯泰再次强调道德与宗教的重要，特别是“不以暴力抗恶”的信念。

4.3 从道德到天国的在你心中

从1884年的《我的信仰》、1887年的《人生论》、1893年的《天国在你心中》到1906年的《论俄国革命的意义》，托尔斯泰一方面继续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语“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确立他心中的道德信念；另一方面，则是从《福音书》中，推出不以暴力抗恶、拒绝服兵役，一直到否定政府、国家存在的必要。晚期的托尔斯泰，服从自己良心与上帝律法，“普世天国就在你心中”，批评殖民主义以至希望各民族能够和睦相处。这不仅不是一位需要退场的传统贵族，而是即使至今，依旧回声不断的开放贵族之声。

《我的信仰》首先揭开了托尔斯泰对传统宗教信仰的质疑，对当权者与教会进行严厉批判，著作因此也开始被查禁。为回应本书的众多批判与回响，于是有了后来的《天国在你心中》。而在这之中的《人生论》，更是之前《忏悔录》的自我解答。《人生论》原本书名是包括生与死，但从书名的变化，可看出此时的托尔斯泰，是“迎着光，向光明前进”。《人生论》是经过十多年精神探索的结晶。在书中，托尔斯泰对生命本质、人类幸福、理性、爱情、痛苦、肉体与灵魂等问题进行深刻论述，并提出了属于托尔斯泰独特的生命观。由于现实的道德困境，加速了托尔斯泰朝向宗教福音书的趋向。

“基督教不是神秘的教义，而是对人生的一种新的理解。”托尔斯泰认为，不只道德律令在你心中，宗教的天国也可以在你心中。《天国在你心中》影响后世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与“良心的拒绝”（conscientious refusal）理念深远。尤其是1894年，透过贾内（Constance Garnett）的英译本，在南非的甘地（M. Gandhi）阅读了该书，并与托尔斯泰通信，将“不以暴力抵抗恶人的信条”付诸实际行动，并获得巨大回响¹⁰。

托尔斯泰以《马太福音》“不要抵抗恶人”的信念，说明当时日常生活与真正基督教精神的严重落差。特别是以国家之名，强制要求人们服兵役的荒谬，“让我做出如此可怕的牺牲的国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是绝对必要的？”书中，托尔斯泰回顾过去教会的历史，认为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在公元313年颁布的《米兰诏书》是基督教被世俗国家吸收利用之始。从此，基督教不再被迫害，但随后成立的教会组织，却与国家政权密切合作。特别是，将暴力合法化的军队，成为世俗政府压迫的工具。同样地，托尔斯泰也不同意革命派以暴力手段推翻政权，在他看来，以暴易暴的结果，只会换来另一个暴力政权的循环。他说：“革命的敌人从外部攻击政府。可是，基督教全然不攻击政府，它从内部摧毁政府的基础。”（2006：204）

书中进一步批评普遍兵役制将日益增加人民赋税，国家债务不断成长。另外，军备竞赛以及对外的殖民主义，让国家统治者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托尔斯泰质问，这（强制性兵役）是违反基督教精神，但多数人却为这样的制度辩护。在《论俄国革命的意义》一文中，托尔斯泰有关殖民主义军备竞赛的论述，几乎是准确说明了后来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不管是专制或民主的政府，其灾难都是，日益增长的庞大预算，扩充军备的以邻为敌，“笼罩着一切民族的那种相互斗争、相互恐惧、相互憎恨的愤怒而自私的情绪……”他甚至直指，顺从这样鼓吹暴力的政府，其本身就是纵容与罪孽。而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忘了上帝”，如果记得上帝律法，那么就不会将自己隶属于任何国家，而各民族也才知，如何和睦相处而不是更多的兵戎相见。

在《论俄国革命的意义》中，托尔斯泰进一步认为，西欧各国放弃农业比率的不断上升（英国最甚），是将奴役从国内输出到国外的殖民主义。当托尔斯泰说着，俄罗斯不应步这些西欧国家后尘，并总结“不再服从政府、返回农耕生活”时，这位开放贵族，正是为自己新的史诗命运做出回应。只是在当时没有太多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5 出路：重视义务的开放贵族

进入20世纪后，这位开放贵族走向更大范围的普世人道主义。早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小说中的列文就不赞同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战争。后来托尔斯泰更是明白表达出对波兰的同情。事实上，传统贵族一开始对于新兴资产阶级伴随而来的民族主义是拒斥的。因为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各国王室贵族是相互通婚彼此联系。托尔斯泰与赫尔岑一样，对于俄罗斯新的权贵统治者鼓动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毫无共鸣，甚至挺身反对。流亡海外的赫尔岑，由于表达俄罗斯于1831年镇压波兰革命的不满，并直言对波兰被压迫者的同情，其影响力大受冲击，但托尔斯泰并不因此而有所退却。

1906 年小说《为什么？》几乎是重蹈前辈赫尔岑的脚步，表达对波兰的深切同情，虽然他的前提是，不同意波兰的武装暴力反抗。《为什么？》可说是写实般地，直指当年尼古拉一世镇压波兰的暴政，是“败坏和愚弄俄国人民”。波兰年轻人米古尔斯基，为了反抗俄罗斯入侵，失去所有财产并被流放；而在阿尔平娜心中，他是伟大的英雄与受难者，为此，阿尔平娜追随米古尔斯基并与其结婚。然其婚后生的子女，因为没能得到好的医疗而病逝，后来帮忙米古尔斯基逃跑也失败。书名《为什么？》正是阿尔平娜向人们、向上帝提出悲痛的提问，虽然她知道，不会有答案响应。¹¹

而另一方面，托尔斯泰虽然依旧不同意革命派的暴力手段，但他日益增加对革命派的同情。《我不能沉默》中，托尔斯泰直指沙皇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责革命家，因为“没有你们，就不会有他们”，他们是你们的学生、产物与孩子。托尔斯泰甚至列举四个理由，认为革命者的作为可以从轻。托尔斯泰后来还对其秘书布尔加科夫（V. F. Bulgakov）说道，他不能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攻击革命者，“他只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谴责他们，而没有深入到他们的内心”（布尔加科夫 1983：115）。¹²

5.1 光在黑暗中发亮：出走

1882 年《忏悔录》完成后，托尔斯泰一方面积极社会改革，希望改善贫苦大众的生活处境，一方面开始质疑、甚至否定私有财产，终至与结婚多年的妻子龃龉不合。原本之前只是精神出走，如小说《哥萨克》，至此，则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之后，“不能这样生活”地开始与其亲属家族，陷入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痛苦境地。

前面曾提及巴赫金的评论：托尔斯泰的最后三个剧本《彼得·梅塔尔》、《活尸》与《光在黑暗中发亮》都是以“出走”作为主题。而这共同的主题，正反映出他晚年的自传性处境。戏剧的主角意识到，自己生活地位的罪恶，希望能从这样的环境中脱离。《彼得·梅塔尔》里，彼得卖身为奴，以偿还他欠下的债，然而他传统的价值观，并不允许他交出全部财产；《活尸》中的费佳老爷，则是看到周围生活全是虚伪，自己只好充当“活尸”，以便不去干扰他人生活；而《光在黑暗中发亮》，则是尼古拉经历了一次离家出走不成的家庭悲剧。

1900 年《光在黑暗中发亮》虽未全然定稿，但却是托尔斯泰现实生活的真实处境。主角尼古拉清楚，是他个人的信念带给周围人们不幸与痛苦；但尽管如此，他却依旧认为，个人信念的正确与否，不是根据其究竟带给他人幸或不幸，而是应以本人良心为依归。在坚持信念与眷恋家庭之间，尼古拉觉得他应离家出走，但现实上，他却做不到这一点。由于尼古拉做不到自己宣称的理念，其言行不一遭到外界指责，于是只好装疯卖傻。

戏剧《光在黑暗中发亮》，我们可以将之解读为，一位即将破茧而出的传统贵族内心的思绪与挣扎。他希望实践他的诺言，但却又不希望伤害到孕育他的环境与挚爱的亲属。

这样的内心交战，不仅存在于托尔斯泰的小世界，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同时也发生在他与大世界沙皇政府与东正教教会的日益升高的冲突中。特别是《复活》发表后，1901 年 2 月，东正教的最高议事机构主教公会，正式开除托尔斯泰教籍。为此，1901 年 3—4 月，托尔斯泰分别写就《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与《答主教公会 2 月 20—22 日的决定》，以为响应。

《致沙皇及其助手们》呼吁书中的“我不是把诸君当成敌人，而是当成兄弟”，读来割切。托尔斯泰痛心说着，俄罗斯如今分成两个敌对阵营，其罪责不在那些我们称为不安分守己的人民身上，而是我们政府本身。唯有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处境，才能达到真正的长治久安。而关于回应“开除教籍”部分，托尔斯泰则引用柯勒律治（S. Coleridge）的名言：“凡是开始时爱基督教胜过爱真理的人，很快地就会爱自己的教会或教派胜过爱基督教，最后则必定是爱他自己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表明他是走着相反的道路，而真理与其理解的基督教是一致的。

在大世界，由于托尔斯泰声名巨大，沙皇政府技巧地将他孤立起来，书籍被查禁，甚至将其秘书古谢夫（N. N. Gusev）流放外省，但就是不动托尔斯泰本人。而小世界，托尔斯泰则是与索非亚理念愈来愈远，尤其是放弃著作权部分。

1908年《我不能沉默》，其后面这些话语，正是托尔斯泰晚年找寻出路，内心的自我告白：

“这一切都是为我而做，我是这些可怕事情的参与者。这样的断言不管多么荒唐，我还是不能不感觉到，在我这宽敞的房间、我的午餐、我的衣服、我的余暇和为了铲除想要夺取我享用之物的那些人而造成的可怕罪行之间，有着毫无疑问的从属关系……，我今天的安宁实际上有赖于政府现在制造的恐怖。认识到这一点，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应当从这种痛苦的处境里解脱出来。

不能这样生活，至少是我不能这样生活，我不能，也不会再这样生活了。”

5.2 出路：不再服从政府，返回农耕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高度评价《安娜·卡列尼娜》，称这是艺术作品的尽善尽美之作。在1877年《作家日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评论中，他认为，对“个人或社会，哪方该负责任”议题，竟能回答得如此深刻，超越当时欧洲文学。他如此总结：这对于任何一位想自居人类裁判官或手上拿着天秤的人，应该有多少启示啊！正如托尔斯泰在书中透过安娜的长辈，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如此说着：“可以裁判的，只有上帝，不是我们凡人”。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一时间，对列文反对战争的诸多批评，令人错愕。或许可以这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只及斯拉夫民族，而托尔斯泰的贵族出身，却让他从褊狭的民族主义脱身。

近30年后的著作《论俄国革命的意义》，文学家蜕变为政论家的托尔斯泰可说实践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广义的“优秀人物”期许，将局限的斯拉夫主义，开放为普世的“俄罗斯选择”。

究竟是继续东方民族屈从的老路，还是重蹈西方民族代议制的覆辙，在1906年的《论俄国革命的意义》中，托尔斯泰则以“不再服从政府、返回农耕生活”，在最大的普世意义上，期许着俄罗斯的未来，“因为过着农耕生活的人最不需要政府”：

正处于这两种民族之间，学到了一些西方手段，但至今仍在对政府俯首听命的俄罗斯民族已经被命运放到了这样的地位上，它应停下脚步，细细地深思，因为它一方面看见对专制政权的屈服已使它同东方民族一起遭受了那么多灾难，另一方面它又看见，西方民族限制政权并把它扩大到全民的做法也没有减轻人民的灾难，而仅仅是使这些民族的人受到腐化并且面临必须靠欺骗和掠夺其他民族才能生存的局面。俄罗斯民族自然应该设法用其他方式来改变自己对待政权的态度，而不能照西方民族那样去改变它。

对比于托尔斯泰在《卢塞恩》里，对西欧文明的批评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1862年西欧之行后，发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直指“自由、平等、博爱”，是口号的乌托邦。特别是“博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真正的博爱，“不应是独立的个人即自己之我来谋求自己与其余所有的人具有同等价值和同等权利……不仅如此，这个因不平而诉求的个人，首先应当把自己整个的我，把自己整个献给社会，并且不仅不要求自己的权利，而是相反，把自己的权利无条件地献给社会。可是西方人不习惯这样的做法。他们大声疾呼地提出要求，要求权利，他们想分享权利，这样就不会产生博爱了”。

而在1906年那时，托尔斯泰更看出了，只看到自己权利的“西方民族代议制”，最终是将自己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对其他弱小民族的痛苦剥削上。他甚至直指当时，经历1895年日

清战争与 1905 年日俄战争的日本，从欧洲那里学会了这种腐化文明，“准备用那些本来用以对付他们的办法来回敬自己的压迫者。”也因此，西方普选制的结果是，以前要供养的是少数的王公贵族，而今却是“成千上万的小帝王”。“这种虚构的限制政权，仅仅是统治者的替换与人数增多，从而又使人们变得更加腐化、愤怒和凶恶。”

对照今天绝大部份的“选民”，只注重自己的“权利”保障，几乎完全无视自己理应善尽的义务。甚至继续如此，会伤害社会整体福祉，竟也在所不惜。或许，我们可以学习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高度佩服托尔斯泰的“识见”。因为这几乎是，之后一百年来的“普世政治寓言”。

5.3 复活：这也是一条康庄大道

前面提及，因为十二月党人的失败，俄罗斯出现了几十年的“多余人”困境。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是传统贵族在新时代所能达到的“最美丽身影”。那无所作为的“奥勃洛莫夫精神”，让妻子阿加菲雅与曾经情人奥莉加相拥而泣，而仆人扎哈尔则一直不愿意离开他主人的栖息地，沦为老乞丐更是令人动容。这是传统贵族的完美形象之一。

1862 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提出合理利己主义的“新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 1864 年写下《地下室手记》，从温情人道主义转向现实人道主义，那是他的“地下室人”告白。而在托尔斯泰 1899 年的《复活》里，则描绘出一个“复活、觉醒的人”。一个回顾过去、不断自省，最后跨越个人出身背景，有着最广义的宗教信仰，回“复”，并重新“活”过来的人生新选择。

这是一位传统贵族，历经忏悔后，迈向开放贵族的“复活”重生。在 2010 年，纪念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的纪念文集中，明尼斯基 (Ilya Vinisky) 发表一篇，讨论《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过世前的“觉醒”之梦，引起 1860 年代许多俄罗斯人的精神觉醒 (2010: 120—137)。“是的，这就是死。我死了，我也就醒了。是的，死就是觉醒！”接着，托尔斯泰继续描述安德烈公爵的心灵豁然开朗了，“那张至今遮蔽着未知世界的帷幕在他心灵前面揭开了。他觉得内心被束缚的力量获得了解放，身上那种奇妙的轻松感也不再消失。”这是跨越自己出身，走向新世界开端的开放贵族的最初完美形象。从《战争与和平》的安德烈可以直接联系到《复活》的聂赫留朵夫。

《复活》作为托尔斯泰的晚期风格作品，社会写实考虑远高于艺术技巧，它是俄罗斯社会大变动之前的寓言之书。在 1930 年巴赫金所写的托尔斯泰文学作品全集第十三卷的《〈复活〉序言》中，更称这小说“不仅对俄罗斯，而且对西方来说，都是一部最彻底、最完美的社会思想小说的典范”。而在罗曼罗兰 (R. Rolland) 的《托尔斯泰传》中，甚至认为《复活》是其艺术上的暮年遗嘱，是继《战争与和平》之后的另一高峰代表作。

小说主角聂赫留朵夫，就像经过忏悔之后的托尔斯泰¹³。一方面为了小说的写实符合真实，托尔斯泰实地走访监狱、法庭、农村，查阅大量档案数据；另一方面，小说进入第二部之后，透过这位过去拥有特权的封建贵族聂赫留朵夫，重回自己庄园领地时，乡下的贫困不人道，他再也无法视而不见，“他觉得事情一清二楚，因此弄不懂像这样清楚的问题别人怎么看不出，他自己长久以来怎么也看不出来”；第三部跟着犯人到西伯利亚的过程中，进而不断质问自己：“到底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人，还是做出我所看到那些事的人疯了？”

罪行的证据比比皆是，而我们却能够视而不见？这是应然问题，应该看得见，但却真实地仿佛大家都没看见。这个“看见”过程，是聂赫留朵夫也是托尔斯泰的复活过程。

贝多芬与托尔斯泰的晚年，两人分别都已在音乐与文学上获得巨大声名，其实也都不须如此“与世难谐”。然而不同的是：一个是刚兴起的资产阶级贝多芬，一个是走入黄昏的贵

族托尔斯泰。《复活》出版后，托尔斯泰被东正教开除教籍，俄罗斯政府甚至必须预防，宣布“托尔斯泰死后，禁止一切示威游行”。

那些永远在冲撞自己局限的人，是晚期风格中“与世难谐”的史诗英雄。托尔斯泰清楚地将自己盘桓、痛苦与挣扎的一生，真实地烙印在其作品上。而阿多诺在评述贝多芬音乐时，曾这么说着：“凡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局限，而成功者，皆属失败之作”。（2009：187）阿多诺以此高度礼赞贝多芬音乐，我们认为，同时也适用于托尔斯泰的晚期作品，“它冲撞它自己的局限”。而托尔斯泰在消极“与世难谐”之外，更是往前踏出积极的“继续前行”。

在小世界与大世界的交互煎熬之下，余命不多的托尔斯泰，决定离开传统贵族庄园，再上“旅途”，走向开放贵族。出路是，正如托尔斯泰写给图拉省波罗夫科沃村的一位农民的信里提到的，“一间虽然很小、但还暖和的单间小屋”。而正如写给妻子索非亚的离别信中所说的，“除了其他种种原因，我不能再在我从前所生活的那种豪奢条件下生活了。我现在所做的，是在我这个岁数上的老年人通常所作的，——离开尘世生活，以求在孤独、宁静中度过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天。”

托尔斯泰的“继续前行”，让人想起萨依德得知罹患白血病后著述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书末，转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在土耳其的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提及12世纪在萨克森的僧侣雨果（Hugo of St. Victor）的诗篇¹⁴，那是：

对一位实践者的心灵来说，成就德性的开始，首先要学习一点一滴的、努力改变可见且变动的事物；在经历如此锻炼过程之后，才能在最后将这些一起抛诸脑后。一个人若觉其故乡是甜蜜的，那他仍旧只是一个纤弱的初学者罢了；而当他认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时，则可算是强者；但当他将整个世界视为异域他乡，则应就是完人了。纤弱的灵魂只将他的爱固着在世界的某一个点上；强者则将他的爱扩充到全世界；但完人最终却止熄了他所有的爱。

奥尔巴赫把僧侣雨果的独立自主、甜蜜怀乡、执着履行，以至放逐他乡的过程，认为这“对于想要好好爱这世界的人而言，也是一条康庄大道”。（萨依德 1983：7）奥尔巴赫、萨依德学习如此，而托尔斯泰的一生更是具体而微。那最终的“梁赞——乌拉尔在线的阿斯塔波沃”车站，一方面，确实是传统贵族托尔斯泰的生命终点，“最终止熄了他个人所有的爱”；但另一方面，那是开放贵族托尔斯泰的精神起点，“最终鼓舞了所有理想主义者的爱”。

6 比权利宣言更重要的义务宣言

西欧社会并没有传统与现代的衔接问题。二元革命是从西欧本身的传统蜕变出来的现代，其现代是建立在传统变迁的基础之上。早期西班牙、葡萄牙对美洲的殖民，是残酷的对整个传统社会的彻底破坏；而后，当带着二元革命的法国与英国，取代对美洲、非洲与亚洲进行殖民时，此刻已是全球化大变局的开端。作为一个像欧洲、又不像欧洲的俄罗斯传统社会，40岁左右的托尔斯泰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反省着这个对俄罗斯影响深远的战争，做了一个非西欧观点的历史哲学省思。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透过列文批评欧化派，“学会了法语，却牺牲了朴素的语言”；此外，英语频繁地出现，还有铁路与银行。此时，二元革命深深影响着俄罗斯社会，而接近50岁的托尔斯泰，面对几乎是无可抵挡的趋势，其生命危机反映了传统贵族的存​​在意义危机。

在《忏悔录》里，我们看见托尔斯泰越过布尔乔亚，直接联系上普罗大众，从而克服了自己所属阶级的危机。经过“复活”后的托尔斯泰，他并没有和众多传统贵族一样，选择与新兴布尔乔亚“历史性妥协”，成为“贵族资产阶级”权贵的一分子。他以“忏悔贵族”的角色重新出发，要求包括传统贵族、布尔乔亚与普罗大众共同携手，从社会整体福祉考虑，

就在现世此岸，创造尘世天国。而这，早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普拉东叙述，以及《安娜·卡列尼娜》里列文与农民一起并肩割草劳动，就已看出端倪。

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或许能理解，为何托尔斯泰晚年坚决要放弃所有财产，不能继续“说一套，做一套”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他不仅是与家人，也是与周遭熟悉的权贵世界分离。而其心志，正是迈向最广泛的他者前进。其晚期的作品与其言行证明，即使当今世界，贵族依旧有其积极存在意义。

布尔乔亚以个人主义出发的“权利宣言”，在光鲜亮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下，掩藏着对国内弱势者以及国外无力反抗民族的剥削。资产阶级成了“成千上万的小帝王”，即使伤害社会整体福祉也在所不惜。而由托尔斯泰所带动出的开放贵族意义则是，重新唤回对整体福祉考虑的“义务宣言”。而这是对过去传统贵族强调的职责本分的再确认，并在遗忘一段时间后，由托尔斯泰再一次身体力行。而这是属于开放贵族，对当今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强而有力的振聋发聩之声。

晚年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篇幅日益浅显、寓言与通俗化。此时的他在意的是，一般百姓能否理解他写的小说，甚至他还会尝试念给农民听，请他们发表意见。而这正是《艺术论》观点的实际练习。托尔斯泰生命最后的几个短篇（如《同路人的谈话》、《过路客和农民》、《村里的歌声》、《乡村三日记》与《沃土（日记摘录）》等）与贝多芬晚期的六首钢琴小品（Op.126），有某种程度的“异曲同工”：那就是，装饰繁华尽蜕，接近石化风景，正如阿多诺在评述那六首钢琴小品所说的：“它们不只是音乐里最强大生产过程的碎片和纪录，它们令人惊异的精简还透露一种奇特的节缩，以及一种无机的倾向，通往不但是贝多芬，或许也是一切伟大晚期风格的最深邃秘密。”（2009：236）本文认为，在晚期风格上，托尔斯泰正是文学上的贝多芬。1934年阿多诺认为，贝多芬的晚期风格，是对他所处社会的自我放逐；1978年柏林（I. Berlin）则认为，托尔斯泰的直见往往令人不安，他“充分运用这天赋，破坏了自己与读者的平静”。（1987：312）

对贝多芬的“封闭式”尊崇，其实是误解。他音乐的一生，是建立在对各方面的挑战与创新之上的。贝多芬晚年作品，甚至是一种暴躁的手势，将音乐弄得和声枯萎、瓦片纷飞。

而托尔斯泰的晚年作为，就像贝多芬第五号命运交响曲最后，乐声一直不想停止，希望越过“最后一刻”，之后的之后。如此“继续前行”的晚期风格，虽然现世生命有一定终点，但其所散发的力量，真如“永远在旅途中”，让后人缅怀不已。它仿佛期待注视着后代子孙，看我们如何响应与学习，“在争取权利的同时，也知履行应尽义务”，而那确实是传统贵族走向开放贵族的最美丽身影之一。

附注

1 有关托尔斯泰的相关著作与小说人物名称，以木马文化出版的10本草婴翻译的版本为主，另以汝龙（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7卷《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为辅；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关著作与小说人物名称，则是以22本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全集译本为主。

2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来年的《作家日记》中，两次提及“优秀人物”的定义。他痛批新时代富有的商人自视为优秀人物，并指出整个俄罗斯大贵族优秀的开放传统是自彼得大帝（Peter I, Tsar）1722年制定《官阶表》之后，才渐渐与人民大众疏离与分裂的。

3 关于“史诗”概念，西方古典美学的说法诸多差异，这里是指作品呈现，对具体事物的整体感知。社会巨大变迁，人物情节，能具体而微地呈现这变化，像诗一般精练地铺陈出来。即使是最枝微末节的场景安排，也会与这整体主题息息相关。黑格尔（G. W. F. Hegel）曾经把“史诗”诠释为对事物整体的掌握。黑格尔非常早就预示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会造成对这“整体”史诗风格的危害（卢卡奇1950：155）。

4 1902年，已经74岁高龄的托尔斯泰，曾应其传记作者比柳科夫（Pavel Biryukov）之约，开始写作《回忆录》，尝试回顾其一生（1906年之后就停笔，以致未完成）。在这本著作前面的引言里，托自己将其一生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14岁以前，美好的第一；然后是接下来的荒唐20年，第二；结婚后18年，以至精神上的新生，是第三；之后又生活了20年，以至他当时“希望这样生活，一直到死”的第四。若说这第四个时期，即是托尔斯泰的晚期风格时期，实也恰当。在回忆录中，托清楚表达对这第四时期的心情：“对比现在这样的生活，我看到了过去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不想改变这样的生活，除了我在以前养成的坏习惯之外。”

5 这是一本“满溢”的历史小说。托尔斯泰不仅在开头写了作者序，谈论艺术家与史学家的任务不同：故事中，或是第一人称，或透过主角喃喃自语，道出生命体悟旁白；甚至在最后的“尾声”第二部，思索着人类历史的“自由”与“必然”。

6 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勾搭家庭女教师罗兰小姐，被太太陶丽发现后，睡在书房起来后，说道“最糟的是什么事都怪我，都怪我，可我又没有错。全部悲剧就在这里，啊呀呀！”卡列宁抱怨安娜让他受罪，做了不离婚维持现状的决定后，说道“她活该倒霉，可我没有过错，我不能因此受罪。”而列文则是，不愿更积极地把产业让给农民，在自问难道公正行动只能是消极的吗？他自言自语道：“那又怎么样？又不是我的过错。”而列文的太太吉娣，在维斯洛夫斯基的刻意亲近，以及列文的忌妒下，激动哭泣地说：“但是，列文，难道你看不出这不是我的过错吗？”

7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作家日记》中，批评这样的“列文问题”。《安娜·卡列尼娜》第六部里，列文与一起打猎的朋友，谈及地主与农民不公平的付出与收获，但列文又不愿采取积极行动，最后结果是自问了“难道公正行动只能是消极的吗？”，然后又自我响应“那又怎么样？又不是我的过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正直的人需要真理”为名，责难列文这样，“不善于解决困惑他的问题”。

8 对比托尔斯泰心灵危机，穆勒（J. S. Mill）也曾在其《自传》中，详述1826年他的危机。而那是资本主义背后运作的思想基础的功利主义价值第一次遭到根本动摇。而最后，感受到自己对于别人的重要，如同小男孩马蒙特尔专注于家人幸福，使得穆勒从绝望的深渊中逐步站起（1957：87，91—92）。而这是多么不同于托尔斯泰，感慨于自己的寄生虫生活方式，立志要向农民大众学习劳动。

9 晚年托尔斯泰，为了希望将其文学遗产为所有人开放，三定其“遗嘱”。在第一次拟定中，还保留1881年以前发表的作品给其家人；但在之后，特别是图拉州法院裁定有效的“定稿遗嘱”里，其所有的作品都从私有变成“公有”。而也因为这个争执，让托尔斯泰最终离家，病逝车站。

10 甘地返回印度后，更以此信念，对当时大英帝国强权，进行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而托尔斯泰则在1910年9月，收到在南非甘地的“印度人意见报”，回信表示赞许。

11 除了《为什么？》之外，《谢尔基神父》是为移居加拿大，反对东正教仪式的新教徒；《舞会之后》则是为1903年“排犹事件”的犹太人受害者，两篇文章都是为响应募款而书写发表。

12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两人，是如何彼此看待对方，应是复杂且精彩。托尔斯泰晚年与高尔基直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甚至说着“很奇怪，他的书的读者居然会有那么多，我不懂这是什么缘故！”（高尔基1959：109）。而另一方面，托尔斯泰过世前时时翻阅的，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13 年轻的聂赫留朵夫，从理想到堕落，与托尔斯泰《忏悔录》里的年轻自述，几乎如出一辙。“当我追求美好的事物时，我是孤零零一人，完全没有依靠。每当我想要透露内心的愿望，想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却是鄙视与嘲笑；而当我沉溺在卑鄙的享乐之中时，我却得到了赞扬和鼓励。”

14 2003年萨依德生命最后，因为再也无法为巴勒斯坦人发声，而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2004：302）。萨依德将自己一生也写成被殖民者的奋斗史诗。另外，爱尔兰著名的摇滚乐团U2，公元2000年的专辑《无法遗忘》（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其第四首歌曲《继续前行》（Walk On）献给翁山苏姬，歌词内容可看出僧侣雨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

托尔斯泰著作

中译本：

- 列夫·托尔斯泰. 艺术与人生 // 艺术论[M]. 耿济之译.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81.
- 列夫·托尔斯泰. 人为什么而活[M]. 许海燕译. 台北：志文出版社, 1995.
- 列夫·托尔斯泰. 傻子伊凡[M]. 许海燕译. 台北：志文出版社, 1995.
- 列夫·托尔斯泰. 伊凡·伊里奇之死[M]. 许海燕译. 台北：志文出版社, 1997.
- 列夫·托尔斯泰. 人生论[M]. 许海燕译. 台北：志文出版社, 1997.
- 列夫·托尔斯泰. 村中三日——列·托尔斯泰散文集[M]. 刁绍华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共十七卷）[M]. 汝龙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 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共十卷）[M]. 草婴译. 台北：木马文化, 2004.
- 列夫·托尔斯泰. 天国在你心中[M]. 孙晓春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 列夫·托尔斯泰. 忏悔录：托尔斯泰精品集[M]. 刘季星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英译本：

- Leo, Tolstoy. *The Gospel In Brief*[M]. Isabel Hapgood (tra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 Leo, Tolstoy. *Plays (Volume Three, 1894—1910)* [M]. Marvin Kantor with Tanya Tulchinsky (trans.).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eo, Tolstoy.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M]. Constance Garnett (tran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6.
- Leo, Tolstoy. *Last Steps: The Late Writings of Leo Tolstoy*[M]. Jay Parini (ed.).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其他中文部分：

- 阿多诺 (T. Adorno). 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M]. 彭淮栋译. 台北：联经出版, 2009.
- 巴赫金 (M. Bakhtin). 巴赫金全集（全六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009 年出版第七卷)
- 柏林 (Isaiah Berlin). 俄国思想家[M]. 彭怀栋译. 台北：联经出版, 1987.
- 布尔加科夫 (V. F. Bulgakov). 垂暮之年：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纪事[M]. 陈伉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 冈察洛夫 (I. Goncharov). 奥勃洛莫夫[M]. 陈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 高尔基 (M. Gorky). 高尔基选集：回忆录选[M]. 巴金, 曹葆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卢卡奇 (G. Lukacs). 托尔斯泰论[M]. 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 1987.
- 罗曼罗兰 (R. Rolland). 托尔斯泰传[M]. 傅雷译. 台北：帕米尔书店, 1992.
- 莫德 (Aylmer Maude). 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二卷）[M]. 宋蜀碧, 徐迟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4.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编). 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C].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 陀思妥耶夫斯基 (F. Dostoevsky).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共二十二卷）[M]. 陈燊主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其他英文部分：

- Adorno, T.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M]. A.G. Mitchell and W.V. Blomster (trans.). London: Continuum, 2007(1947).
- Benjamin, Walter. *Reflection: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M]. E. Jephcott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8.
- Berlin, Isaiah. *Russian Thinker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6(1962).
- Lukacs, Georg. *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 A Sociological Survey of the Writings of Balzac, Stendhal, Zola, Tolstoy, Gorki and Others*[M]. E. Bone (trans.).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50.
- Lukács, Georg. Realism in the Balance[A]. pp. 28—59. // Ronald Taylor (ed.). *Aesthetics and Politics*[C]. London: Verso, 1980.
- Mill, J. S. *Autobiography*[M].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57.

-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 Said, Edward. *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 Map*[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 Said, Edward.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6.
- Said, Edward.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Book, 1975.
- Said, Edwar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M]. Vintage, 1983.
- Vinisky, Ilya. The Worm of Doubt: Prince Andrie's Death and Russian Spiritual Awakening of the 1860s[A]. in Donna Tussing Orwin (ed.). *Anniversary Essays On Tolstoy*[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An Open Aristocrat Out of Tradition

— On Late Style of Leo Tolstoy

Herbert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Taiwan 333)

Abstract: The hegemony of the bourgeoisie is still better than the cultural apparatus of the proletariat. The point in discussing late style of Leo Tolstoy is derived from this aristocrat's discontent toward bourgeois civilization. Tolstoy's late works are filled with concerns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enables us to accept aristocrats' positive role. His novels like *War and Peace* and *Anna Karenina* found no way for the traditional aristocrats doomed without a future. After a confession out of the misanthropic and lonely moodiness, Tolstoy accomplished the expectations for aristocrats, as described in Fyodor Dostoevsky's *The Adolescent*. Therefore, it is a natural advancement for Tolstoy to change from literary productions to public critics. In response to *What Then Must We Do*, Tolstoy challenged himself by his own traditional aristocrat background. The late writings of Tolstoy are about morality and religion, in which he insisted the doctrine of non-resistance to evil by force. Neither born to the oriental fate of submission, nor learning from the occidental representative system, the aristocrat Tolstoy suggested the disobedience to the regime and turned back to the agricultural life. When finally Tolstoy came to the decision of leaving home, he walked forever against the grain of his contemporaries. We can also say that it is the symbolic epic of aristocratic resurrection of an open aristocrat out of tradition.

Keywords: late style; against the grain; obligation

作者简介：王贺白，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14-03-04

[责任编辑：刘 锟]